

#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尚季芳<sup>1</sup> 但唐军<sup>2</sup>

(1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2 重庆市第 29 中学, 重庆 400010)

**摘要:** 民国时期, 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 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 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 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 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 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 以 1937 年为界, 该年之前, 内销大于外销, 尔后, 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关键词:** 民国时期; 甘肃; 鸦片; 贩运路线; 贩运群体

**中图分类号:** K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2010)01-0067-06

终民国一代, 甘肃成为中国的鸦片生产和运销大省, 与毒品大省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和山西齐名, 所产“西土”享誉全国, 深受烟民喜爱。斯时, 甘肃财力困窘, 维持社会运转的正常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靠着鸦片的产销所带来的利润成为政府、军阀、商民、社会次生群体和农民的主要财源。因是之故, 鸦片贩运十分猖獗, 公开贩卖者有之, 秘密转运者有之, 军阀支持者有之, 商号自运者有之, 等等情形不一而足。本文拟就甘肃鸦片贩运群体、贩运路线及贩运原因作一初步梳理, 以就教于学界。

## 一、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的主要贩运者

民国时期, 甘肃鸦片生产数量巨大, 运输贩运鸦片利润颇丰, 参与贩运的群体众多, 主要贩运群体有军阀、商号、马帮和驼帮。以下就各个群体的具体情况作一分析。

贩运鸦片的第一大群体是军阀。冯玉祥统治甘肃时, 鸦片贩运就是靠其军队来实施, 私人不得插手。他们以极低价格将烟土收进来, 再偷贩到东南沿海, 赚好几倍利钱。军队运烟的方式很巧妙, “当他的队伍要调开的时候, (假如是由甘肃开往陕西, 或是由陕西开往河南), 该部队先要多拉民间车马, 拿空籽(子)弹箱装满了烟土, 便很安全的直运到冯氏的驻地, 每开一团军队, 最少总要运烟几万两”<sup>[1](101)</sup>。

国民政府时期, 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利用贩烟发了大财。甘肃河西各县和临夏地区名义上属甘肃所辖, 地方长官由甘肃省府所派, 但驻军为青海马步青和马步芳, 地方政治和经济受其牵制甚大, “随

收稿日期: 2009-10-11

作者简介: 尚季芳(1976-), 男,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副教授、在读博士后。

但唐军(1973-), 男, 重庆市第 29 中学, 教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08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近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危害及禁毒研究》(项目编号: 08JC770020)的阶段性成果; 2009 年第 45 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毒品危害及禁毒研究》(项目编号: 20090450729)的阶段性成果。

便派款、征兵,干涉地方行政和宗教信仰,稍不如意,责难纷至”<sup>[2](280)</sup>。河西地区是当时甘肃省的重点产烟区,马氏兄弟利用权势廉价收购烟土,加工配置,运销外地。例如张掖商会给马步芳加工的鸦片烟块,名曰“甘泉”,每件重 118两;忠义德土店加工的叫“忠记”,每件重 112两;还有其它土店加工的如“祥记”等。<sup>[3](228)</sup>随后将这些半成品武装贩运各地。

贩运鸦片的第二大群体是商号。商号主要以城镇坐庄为主要形式,资本实力比较雄厚。除了经营其它货品外,收购和贩卖鸦片也是他们的主要业务。每年烟季,他们派人到产烟区大量收购烟土,一面在城镇自设商号出售零土,供烟民吸食;另一方面则贩卖于外地,获取厚利。1935年前,商号的贩运未受任何限制,只要纳税,即可自由贩运。1935年之后,实行了分期禁绝政策,贩运只能在未禁绝县份之间来往,而不能运往禁绝县份,但实际上此时禁绝县份烟价大涨,更有利可图,商号偷运者大有人在。

当时经常发现一些商家被抢,有些是在贩运途中,有些是在城镇所在店铺,被抢财物里大都有鸦片。1936年 2月 9日,在靖远水泉镇开设协同瑞商号的雷金斗,遣其妻弟李宝春运送鸦片 700余两,前往县城丰盛店销售,获得货款 200余元,返回途中被匪打死,劫去所有货款。<sup>[4](12)</sup>1936年 6月 17日,在灵台县朝那镇发生土匪抢劫商民事。土匪 7名,身着便服,内有 2人携带手枪,在商民赖廷彦商铺内开枪横击,将赖捆绑,任意拷打,拉去骡子 1头,抢去烟土 500余两,大洋 430余元,并有其它物品。<sup>[5](7)</sup>1936年 11月 14日午夜,华亭县第一区第二联保来土匪 6人,持快枪 2支,将豹子沟商民高生连用刀戳死,抢去烟土 110余两,纸烟 2条,票洋 20余元。<sup>[6](13)</sup>从上述事例看出,商号之所以被土匪看中,就是他们有存土或票洋,每一次被劫都能发现若干存土,可见商号是收购或贩卖存土的一个主要群体。

马客(又名脚户)是第三大贩运群体,主要以河州(今临夏)回族为主。据张思温先生估计,临夏的脚户最盛时,约上万头牲畜,骡、马和驴都有,“专跑外脚的牲畜约四千头以上,赶脚的约二千人以上(最低数字)”。这些脚户的贩运路线基本上覆盖了甘肃全省,省外抵达四川、陕西、新疆和青海等地。<sup>[3](210-211)</sup>贩运的主要货物,除日常商品外,还兼代贩运鸦片,有些直接以鸦片为主。

马客贩运鸦片的主要地点是四川松潘和阿坝一带,这里烟苗遍地,盛产烟土,“唯一可向外销的就是大烟”。马客将日常用品运往藏区,又将鸦片输出,对当地经济影响很大。曾在此地做实地调查的于式玉看到藏族“家中日用的器具,身上带的饰品,凡是值钱的东西,无一不是西北的输入品——原因就是由西北的回商输入进来的”<sup>[7](557,558)</sup>。回商在这些地区极受优待,他们在黑水“向例驻扎在芦花衙门,作为向外活动的根据地”<sup>[8](514)</sup>。显然,马客在这里与地方头人过从甚密,互取所需。

需要提及的是,马客在川北贩烟,与马家军阀收取保护费,充当保护伞分不开。据王德清、家玉琴回忆,临夏地区的统治者马步芳利用马客大发其财。当时规定:“凡去那娃、黑水的‘马客’有马者,回来后每匹马交款二百元(硬币),无马的交一百元。”从 1938年至 1949年,每年收去税款六、七万元,十年共计约六百多万元。<sup>[9](81-82)</sup>据档案资料载,1948年 1月,马步芳派军官韩启元坐驻临夏,专门负责催办临夏各县前往川北贩运鸦片者之保送费,“其收款额,每单人计收硬币五十元,如带有骡马者,每匹收硬币二百元”<sup>[10]</sup>。烟客将鸦片贩运到临夏后,还要给地方部队和官吏以贿赂,以便在其保护下,公开在临夏市场上出售。当时受驻军包庇保护的鸦片烟铺有 80余家,“甲等,每期交该部白洋一百元,乙等六十元,丙等三十元,半年为一期,可收费白洋共三千六百元,每到一期,凡应纳该部之款者,均在一二日内缴齐,尚较人民纳缴一般国税、省税容易”<sup>[11]</sup>。可见,马客贩烟和销烟都受马步芳军队的保护,这助长了甘肃毒品的泛滥。

驮帮也是当时贩运鸦片的一个重要群体。该群体盛行于甘肃河西一带,主要以骆驼为负载工具,间有骡马等牲畜,主要承担河西——包头一线的运输任务,偶尔也承担河西——新疆、河西——兰州等线的运输。鸦片是他们来回运输的主要货物之一。1907年芬兰考察家马达汉经过河西时,见到一个拥有 12头骡子驮运鸦片的车队,他们是“从甘州出发经过凉州到太原的,然后从太原通过铁路运往奉天(Mukden今沈阳一译注)”。他又了解到武威的鸦片“大量销往北京和太原”。<sup>[12](413,419)</sup>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内蒙境内考察时,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团长徐炳昶写道:“途中遇几商帮,皆从宁

夏往绥远贩鸦片者。”<sup>[13] (40)</sup> 1931年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的杨钟健在路过绥远时,沿途遇见的客商大多由甘肃而来,“大半是贩皮毛和鸦片”<sup>[14] (69)</sup>。驼帮有些是由马家军阀组建,常年为其专贩鸦片,有些则为地方商号出资雇佣驼户,结成群体贩运鸦片。

甘肃鸦片的贩运者主要集中在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四大群体中,本省所产烟土运出或外省烟土运进,或省内互销,他们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从时间上来看,商号和驼帮在1940年之前比较活跃,当时甘肃鸦片还没有完全禁绝,商号只要纳税,就可以自由贩卖。而1940年之后,甘肃省进行了存土登记,鸦片不能自由买卖,商号参与贩运鸦片慢慢走上了末路。而马客和军队则没有时间限制,1940年后甚至更行猖狂,当时甘肃鸦片种植基本被禁绝,本省所产烟土越来越少,而烟民还大量存在,需要从外运进烟土,他们乘此大肆贩卖鸦片。

## 二、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的主要贩运路线及贩运渠道

民国时期,甘肃省的鸦片贩运路线众多。依据禁烟督察团给省政府的总报告,“在东则有由平凉庆阳西峰镇运往陕境者,在南则有由张家川天水碧口运往川境者,在西则有河西草地运往包绥,亦有由夏河及卓尼所属番地运往川东者。”<sup>[15]</sup>具体言之,出境路线大体有三条,即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河西内蒙线主要将河西地区的鸦片通过骆驼、骡马运往包头、察哈尔等地,然后转运京津一带。临夏成都线,途经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碧口到四川江油,再到成都;另一条分线是临夏、夏河、临潭、卓尼到四川松潘、理县、茂县再到成都。西兰公路线,即将汇聚到兰州的烟经定西、静宁、隆德、平凉到陕西长武、彬县、乾县、咸阳、西安,再转运其它各地;或到平凉后,转入庆阳,再运入陕西;还有一条支线就是秦安、清水、甘谷、武山等地烟土汇聚天水,由天水转往陕西,或进入成县、文县,再转入四川。此外黄河水路也贩运一些鸦片,主要是古浪、景泰、靖远的烟运往宁夏,一部分转入包头。

以上路线大体上是出境路线,入境路线主要为松潘、临潭、夏河的临夏线和内蒙河西线。如夏河县的烟土来源主要有两路,一路为松潘路,系由四川而来,进入临潭,再转入夏河;一路由临夏贩运而来,主要是马步芳将搜刮的烟土投放临夏市场,转销周围各县份。<sup>[16]</sup>卓尼、岷县的烟土主要来源于松潘,进入甘肃后分三路,“一路由卓尼之迭部进而运至旧城,一路由临潭之郎木寺西仓毡哇进而运至旧城,一路由夏河之欧拉进而运至黑错拉卜楞,再由黑错转运旧城”。由临潭旧城集中后,转往其它各县,主要有三路,一路经黑错、陌务和土门关销于临夏;一路经岷县、会川、漳县和陇西,贩销于秦安、清水、甘谷、武山和天水,少数销于康乐和临洮一带;一路经卓尼插岗乡至于武都和文县。<sup>[17]</sup>入境的另一条路线是由内蒙和宁夏,“一从蒙古草地,一从宁夏吴忠堡,类多利用沙漠地带,以马匹或骆驼运送,未到武威县境,即在草地沿途卸藏,然后零星运入县城,再由武威东运至古浪、永登。西运入永昌、山丹,直到酒泉”<sup>[18]</sup>。

关于烟土的运销,1933年至1935年,共外销18168000余两,内销19727000余两,内销大于外销。<sup>[19] (6)</sup>1936年35县的内外销情况,见下表:

各省分期禁种情形报告表 民国25年<sup>[20]</sup> (单位:两)

县名	出产数量	外销数量	内销数量	县名	出产数量	外销数量	内销数量
临洮	254790	8347.7	246442.3	两当	19110	1367	17743
靖远	700650	1750025	2440	临夏	79620	3934.25	75685.75
陇西	382170	16695.4	365474.6	永靖	70050	2934.25	66115.75
岷县	264330	13351.8	2509782	武威	923580	1110526	192470
永登	439500	78000.8	361499.2	张掖	621030	425147	195883

渭源	207000	8347.7	198652.3	民勤	63690	54309	9381
景泰	238860	213551.2	25308.8	永昌	101910	98419	3491
洮沙	136950	8347.7	128602.3	山丹	222930	700	222230
漳县	149700	8347.7	141352.3	临泽	197460	84330	113130
天水	605100	46872	558228	古浪	248400	427102.4	无
甘谷	388560	19575	368985	民乐	152880	300	152580
礼县	261150	3972.3	257177.7	酒泉	171990	135696	34800
徽县	429960	11053.25	418906.75	玉门	28650	199286	103870
成县	398100	39723	358377	安西	28650	765250	98270
秦安	254790	5332	249458	敦煌	79620	89745	85051
武山	302550	19575	282975	高台	175170	204278	23408
西和	127380	3972.3	123407.7	金塔	114660	94860	19800
清水	175170	4603.8	170566.2	合计	9016110	5234401.85	5922739.85

依据上表, 1936年, 在给出的 35 个产烟县中, 其中外销大于内销的县份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玉门、安西、民勤、古浪、金塔、高台和永昌 11 个县, 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河西是马家军阀的势力, 当地鸦片大多由其低价收购, 出售到京津一带赚取巨额利润。靖远县也是产土大县, 销往外地者居多数, 主要是该地靠近宁夏, 宁夏烟贩前来收购者很多。同时该地处在黄河岸边, 运输比较方便, 由此促成了外销大于内销的趋势。其它陇南各县主要以内销为主, 各县烟土除了供给本地烟民外, 剩余部分在临县之间流通。天水“烟毒来源, 大半来自甘谷、秦安、清水、临潭、卓尼、西固、武都一带”<sup>[21]</sup>。庄浪县产烟不多, 存土较少, 在禁烟以前烟民吸食之土均由甘谷、靖远和秦安莲花城等地零星贩运而来。<sup>[22]</sup>总体上, 该年烟土的运销内销大于外销。此时, 六年禁烟计划实施不到一年, 烟民数量巨大, 吸食者还未受到根本性控制, 烟土的消费量甚多。因此, 笔者以为 1936 年以前, 甘肃省烟土内销大于外销。“甘省在未施行禁种以前, 每年外销烟土一千八百万两, 内销二千万两”<sup>[23] (25)</sup>。

从 1937 年开始, 全省烟土外销逐渐大于内销, 该年外销 3392800 余两, 内销 2755770 两; 1938 年外销 120 余万两, 内销 70 余万两。<sup>[19] (6)</sup>主要原因在于甘肃的禁烟取得了一定成效, 烟民的吸食受到了部分控制, 而此时省外对烟土却有很大的需要量, 东南沿海和中原各省从 1935 年就已禁绝鸦片种植, 烟民的吸食大多靠缓禁省份供应, 这无疑刺激了甘肃省的烟土外销。

### 三、政府财政支绌与控制不力: 鸦片猖狂贩运之症结

美国人罗斯认为, 对于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或甘肃等内陆省份的农民来说,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鸦片是他们唯一可以销往发达的商业地区的产品”<sup>[24] (138-159)</sup>。的确, 撇开鸦片是毒品这一层不说, 鸦片对于整个农业经济衰败, 几无其它经济基础的西部省区来说, 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可用于交换外界物品的商品。近代甘肃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来商品, 农民日常所用之烟酒、糖茶、布匹、纸张和铁器以及上层社会的奢侈品等等, 都与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 鸦片收入对维持地方经济运转确实起到过一定作用, 为地方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契机。国民政府时期做过甘肃财政厅长的梁敬鎔也认为鸦片输出对维持全省贸易平衡起了很大作用, “本省过去因为烟土的输出, 年有增加。到民国二十六年输出总量增至三三四七五七八两, 总值为四千八百八十二万一千三百八十元零五角。对于地方

输入贸易的平衡以及金融的调剂,有很大的作用”<sup>[25]</sup>。

此外,民国甘肃军队林立,军费开支庞大,全省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张广建督甘时,1915年财政支出总数 3042104元,有一半以上是陆军费;1916年支出总数 3537677元,有三分之二是陆军费;1918年支出总数 4815859元,有四分之三是陆军费。<sup>[26] (222)</sup>而 1929—1934年军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见下表:

甘肃省近六年度(1929—1934)军费支出总计表<sup>[27]</sup>

军费 \ 年度	合计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总计	46929250	16701910	5996742	4617615	6227216	5752193	7633574
军事补助	29067371	12379482	3278875	2302852	4427277	2778556	3900329
百分比	62%	74%	55%	50%	71%	48%	51%

依据上表,从 1929年以来,甘肃省军费支出一直在财政总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 1933年为 48%,其余各年份都在 50%以上,1929年和 1932年甚至达到了 70%以上,六年平均军费支出为 62%,军费支出占去了甘肃省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故军费支出是民国甘肃省的第一大负担。

如此巨额的军费从何处筹款?斯时,省府库空如洗,养兵之资匮乏,因此依靠着鸦片所获取的款项即烟亩罚款和烟土运销税为甘肃军费的主要来源。甘肃省禁烟局主管征收烟土运销税,其实就是一个为军费而设立的局子。当军政费用短缺时,它会运用各种手段来筹措。1933年 12月,在土药运销疲滞,税收顿减,军政各费无法挹注的情形下,省禁烟局立即制定办法,减免税收,“省城分局,每土百两减为十一元,省外各局减为十二元。……俾商民趁此减税时机,从速运销,藉裕税收,而顾急需。”<sup>[28]</sup>过了 5天,见此法无效,随即制定了《禁烟善后借款证券办法》,制定的起因是“为筹措款项,以顾军政各费”,筹措对象是“由指定各局按照所派洋数,如数发给商民,借获款洋,解交总局”。具体指定的分局及派款的数目是皋兰禁烟善后局筹措现洋 10万元,榆中现洋 5000元,靖远 13000元,武威 20000元,张掖 12000元,共计 150000元。<sup>[29]</sup>显然,此处政府成为鸦片贩运的幕后操纵者。

民国甘肃社会又是一个军阀当道、省府主席权势不固的时期。对于甘肃省政府来说,威胁最大的当数青海马家军阀。此等军阀“名虽听命中央,服从省府,然而在事实上的确不然”<sup>[30] (31)</sup>。前已述及,马氏兄弟握有甘肃河西和临夏地区实权,在省府控制不力的当下,马家军阀大肆种植和贩运鸦片。在河西地区,马家军阀主宰下的烟土贩运猖獗。1940年,甘肃省禁烟督察团第四组组长戴建标督查完河西的禁政后,给民政厅的呈文中写道:“各县局对于禁运禁售,向来抱不问态度,故对于运售甚少案破获,而经营运售之人,为特殊情形方面所派遣。”戴感慨说:“本组在各县局对于禁运禁售,因赤手空拳,毫未推动,仅传闻特殊势力配备武装运售,大批运至绥包或运至新疆以及平凉等地。”<sup>[31]</sup>此处所谓的“特殊情形”、“特殊势力”均指马氏兄弟。对马氏兄弟的行径,地方县长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戴建标在武威督导禁烟时,要求县长陈邦启将售烟犯法办,但“陈县长频摇其手曰:‘办不得。’”<sup>[32]</sup>一句“办不得”道出了河西各县县长的共同心声,反映出县长进退两难、忍气吞声的尴尬处境。诚如马丁·思所说:“在某些地方,地方官员准备采取措施禁烟,但他们不能阻止走私和鸦片贸易。……对许多地方官员来说,军队是惹不起的,如果派一个小分队去缴获鸦片,无疑是让他们去给土匪和军阀送死。”<sup>[33] (188)</sup>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县长来说,要让他们和强大的地方驻军作对,当然是徒劳无益。

对此禁政,甘肃省政府也无能为力。时财政厅朱镜宙回忆,“一天上午,朱主席告诉我:河西有私贩鸦片情事,已被军队捉住;这件事,由我自己来处理,禁烟局不必管。河西是产烟最多的地区,如果真的贩运被捉,那,必定与当地军部有关,禁烟局是个纸老虎,管管小百姓,倒还有些威风;若要管军部,那一定要出洋相,主席似乎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命我不必管。”<sup>[34] (363)</sup>很清楚,省政府对河西的贩烟听之任之,无任何办法,只能任其自由发展。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猖獗,一方面省府财力困窘,无法支付大量的军费,不得不依靠鸦片的产销满足军队开支。政府甚至一度充当了鸦片贩子,前述的禁烟局名为禁烟,实则主管鸦片的运销,既然政府将鸦片作为谋财的重要手段,这就为其它群体贩运提供了口实。加之马家军阀自恃长期以来形成的统治根基,在其统治范围内为所欲为,又把持甘肃河西和临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大肆种烟贩烟,对甘肃省的禁政制造了诸多掣肘。因是之故,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政府贫穷和地方实力派壮大所促生的严重社会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1] 西北写真[M]. 甘肃省图书馆藏.
- [2] 石秋月口述,法元贞曹稷农整理,马为良在临夏[A]. 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1卷)[J]. 2001
- [3] 张思温. 河州经济琐谈[A]. 张思温文集[J]. 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
- [4] 甘肃省府秘书处编印. 靖远县县长杜光预报告该县商民被劫事[J]. 甘肃省府公报第89、90期合刊,1936—06—16(以下甘肃省府公报均为省政府秘书处编印,恕不一一注明)
- [5] 灵台县县长何世英报告第五区朝那镇土匪抢劫商民事[J]. 甘肃省府公报第157、158期合刊,1936—09—05
- [6] 华亭县县长黄金鼎报告第一区土匪行劫事[J]. 甘肃省府公报第211、212期合刊,1936—11—16
- [7] 黑水民风[A]. 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C].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 [8] 记黑水旅行[A]. 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C].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 [9] 王德清,家玉琴. 解放前鸦片烟在临夏的毒害[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J].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 [10] 甘肃省民政厅档案. 五区专署据密报青海马步芳派员以缉捕逃兵为名转磨马贩运烟毒仰严密彻查[R]. 档号15(全宗号)—11(目录号)—217(案卷号),甘肃省档案馆藏(下同).
- [11] 甘肃省民政厅档案. 为函送临夏驻军营部包庇烟馆藉以收款情报乙件请参考由[R]. 档号15—11—367.
- [12] 马达汉. 马达汉西域考古日记[M].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
- [13] 徐炳昶. 西游日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 [14] 杨钟健. 西北的剖面[M].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 [15] 甘肃省民政厅档案. 甘肃省禁烟督察团督察禁政总报告[R]. 档号15—8—404
- [16] 甘肃省民政厅档案. 夏河县废弛禁政之实况由[R]. 档号15—17—37
- [17] 甘肃省民政厅档案. 甘肃省第一区肃清烟毒计划[R]. 档号15—17—115
- [18] 甘肃省民政厅档案. 关于鸦片查缉情形[R]. 档号15—9—259
- [19] 熊道琛. 甘肃禁政概况[J]. 甘肃县政旬刊第1卷第12期,1939—05—31.
- [20] 甘肃省禁烟特派员公署档案. 各省分期禁种情形报告表[R]. 档号11—1—35,甘肃省档案馆藏.
- [21] 据本部检查甘肃省烟毒专员赵威一报告考察天水县禁政情形函请查照办理见复由[R]. 档号15—10—61
- [22] 甘肃省禁烟督察团第二组督察庄浪县禁政工作报告表[R]. 档号15—8—396
- [2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陈晓敏选辑. 全国禁烟密查总报告[J]. 民国档案,2006(1).
- [24] E·A·罗斯. 变化中的中国人[M]. 时事出版社,1998
- [25] 梁敬鎔. 县预算之解剖与县财政之前途[N]. 甘肃民国日报,1939—06—11
- [26] 丁焕章主编. 甘肃近现代史[M].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 [27] 甘肃省近六年度各税收收入总计表[J]. 甘肃省府公报第5卷第1、2、3、4期合刊,1936—01—20
- [28] 禁烟总局减收土药运费[N]. 西北日报,1933—12—15
- [29] 禁烟总局公布禁烟善后借款证券办法,令皋靖等县局筹借现款十五万元[N]. 西北日报,1933—12—20
- [30] 张学孝. 庆祝河西季刊声中我们应有的几种态度和希望[J]. 河西创刊号,1934—08—15
- [31] 甘肃省禁烟督察团第四组督察河西各县局禁政工作总报告书[R]. 档号15—8—404
- [32] 甘肃省禁烟督察团第四组督察武威县古浪县永昌县民勤县张掖县禁政工作报告表[R]. 档号15—8—395
- [33] 马丁·思. 鸦片史[M]. 海南出版社,1999
- [34] 朱镜宙. 梦痕记(下)[M].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第426册)[J]. 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